

# 论《列朝诗集》的编纂始末及其托意微旨

侯 丹

(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, 福建 福州 350007)

**摘要:** 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一书从编纂到刊刻, 历时数十年。其间, 钱谦益因党争之祸而仕途多舛, 并因降清之举大受世人诟病, 而此书的真正完成, 是在钱谦益降清之后。通过对《列朝诗集》编纂起末的考察, 不难发现钱谦益以诗存史之目的和复明赎罪之意图。

**关键词:** 《列朝诗集》; 编纂始末; 以诗存史; 复明赎罪

**中图分类号:** TU 984.2

**文献标志码:** A

**文章编号:** 1008-7192(2015)02-0079-05

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钱谦益的《列朝诗集》编纂历时数十年, 选录了有明一代三百年间近两千个诗人的作品, 并为这些诗人撰写了简明的小传, 为后人了解明代诗人及诗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近年来, 学界对《列朝诗集》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诗学及批评意义的考察上, 而对其编纂成书之过程则较少涉及<sup>①</sup>, 兹仅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。

## 一、编纂始末

明万历三十八年(1610), 钱谦益北上会试, 被时任主考官的宰相, 东林党人叶向高置于第一, 因党争至发榜改为第三名探花, 授翰林院编修。状元易人, 归韩敬所得。五月丁父忧归里, 被置闲十年。

明万历四十五年(1617)夏天, 程嘉燧自嘉定来, 居拂水山庄, 留连旬月。二人切磋诗法, 钱氏之诗大成。《列朝诗集》的编纂最早源于天启初年(1621)程嘉燧在一次读书后的提议。对此, 钱氏《列朝诗集序》有曰: “‘录诗何始乎? 自孟阳之读《中州集》始也。’孟阳之言曰: ‘元氏之集诗也, 以诗系人, 以人系传, 《中州》之诗, 亦金源之史也。吾将仿而为之, 吾以采诗, 子以庀史, 不亦可

乎?’”<sup>[1]678</sup>

元好问编纂金代诗歌的目的是“以诗系人, 以人系传”, 程氏受此启发, 欲以之为蓝本, 编选一部具有诗史意义的诗歌总集, 并为此做了明确分工, 程氏负责采集诗歌, 钱氏专为查考史实。遗憾的是, “山居多暇, 撰次《国朝诗集》, 几三十家, 未几罢去。此天启初年事也。”<sup>[1]678</sup> 这其间, 是什么使其在选录三十家后便暂时搁置呢?

天启元年(1621)八月, 钱谦益被明熹宗朱由校钦点为浙江乡试的正考官。隶属浙党的韩敬派奸人冒充钱氏门客, 授关节于士之有文誉者, 约事成取偿。因韩敬的设谋陷害, 钱谦益落入“关节受贿”的圈套而遭参劾, 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便引疾而归。“浙阉遭陷”是钱氏仕途上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打击。天启四年(1624)秋, 钱谦益以太子谕德兼翰林院编修赴召, 纂修《神宗实录》。但当时东林党和阉党斗争激烈, 宦官魏忠贤专权, 钱氏因属籍东林, 被阉党弹劾, 削籍南归。一路舟中, 草创《开国功臣事略》一书, 历时约三年, 成于天启七年(1627)八月。此期, 因党祸及创作重心的转移, 《列朝诗集》的编撰未得以继续。

**收稿日期:** 2015-03-06

**作者简介:** 侯 丹(1978-), 女,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,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。E-mail:houdan22@sina.com

**注释:** ①这方面的研究论文, 笔者目前所见的有严迪昌(1936-2003)生前所写的《蒙叟心志与〈列朝诗集〉之编纂旨意》(《语文知识》, 2007年第4期), 严先生提出钱氏编纂《列朝诗集》乃为开宗立派、集明诗之大成于一己, 反对陈寅恪称《列朝诗集》“实寓期望明室中兴之意”的说法; 孔爱峰《钱谦益〈列朝诗集〉的编纂学研究》(苏州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)则从钱氏成书条件、编纂体例、人物小传等方面勾勒出《列朝诗集》的史学意义; 孟飞《〈列朝诗集〉稿本考略》(《文献》2012年第1期)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《列朝诗集》稿本和刻本作了比较, 综合考察了钱氏存史的编纂宗旨和反复古的批评立场; 都铁伦《〈列朝诗集〉编纂再探: 以两种稿本为中心》(《文学遗产》2014年第3期)则在孟飞的基础上,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所藏《列朝诗集》的两种稿本为论述重点, 动态地考察了钱氏编纂思路的变化, 认为明天启年间钱氏编此集为存一代之史的说法是需要商榷的。

崇祯元年(1628),明毅宗朱由检登基,使魏忠贤等阉党伏法,起用旧人。七月,钱谦益应召赴阙。十月,参加枚卜大典,在会推阁臣时,被周延儒、温体仁以浙阉旧事攻陷,再次被革职。这是当时年近五十的钱氏在仕途上遭遇的第二次沉重打击。闲居十年间,钱氏召老友程梦阳前来陪伴并修筑耦耕堂。崇祯六年(1633),因母去世,钱氏心情一度愁闷。崇祯十年(1637),县人张汉儒以居乡不法的理由讦告钱氏,宰相温体仁趁机陷害,钱氏和门人瞿式耜遂因“丁丑狱案”被逮至京城,一年后才得以化险为夷。崇祯十三年(1640),江南名妓柳如是过访半野堂,钱谦益于花甲之年情场得意,在两年游山玩水的日子里,写下许多游记诗篇。崇祯十六年(1643),钱谦益把自己历年所写之诗文重新修改润色,厘定为110卷,取名《初学集》,交付门人瞿式耜刊刻告成。此书一问世便获得海内文人之广泛好评,奠定了钱氏明末文坛领袖的地位。需要说明的是,这一年的十二月,好友程孟阳去世,钱氏大为悲痛。这十五年里,钱氏因政治事变、情感悲喜、编订书籍等因素无暇顾及《列朝诗集》的续编工作。

崇祯十七年(1644),即清顺治元年,农民军攻入北京,明毅宗朱由检自缢身亡,明王朝灭亡。南明弘光朝筹建时,钱谦益依附阮大铖、马士英,做了南明的礼部尚书。弘光元年,即顺治二年(1645)五月十四日,清军包围南京,钱谦益跟从其他官员开城迎降,这一举动使其成为世人诟病指骂的对象。顺治三年(1646)正月,钱氏被任命为清朝礼部尚书,兼《明史》馆副總裁。五月,弘光帝被害。六月,钱氏遂引疾南归,再次拾起《列朝诗集》的编选工作。顺治四年(1647),钱氏因曾给予从事抗清活动的黄毓祺资助而下狱,在狱中他还从人借书,遍访明代诗集未见者,坚持进行编纂工作。顺治六年(1649),钱氏狱释还乡,交付门人毛晋刊刻。此后又多次增补,于顺治九年(1652)刻成并作序,书当成于这一年。钱氏《耦耕堂诗序》有云:“崇祯癸未十二月,吾友孟阳卒于新安之长翰山。又十二年,岁在甲午,余所辑《列朝诗集》始出,孟阳诗居丁集中,实为眉目,而余为小传,以引其端,颇能推言孟阳之所以为诗,与其论诗考古之指意。”<sup>[1]781</sup> 癸未即崇祯十六年(1643),甲午即顺治十一年(1654)。钱氏《季沧苇诗序》说顺

治十一年中秋遇沧苇过访,晤谈间其盛赞《列朝诗集》,“部居州次,累累如贯珠。人有小传,趣举其词,若数一二。”<sup>[1]758</sup>

综上可知,《列朝诗集》的编纂最早源于明天启初年(1621)。顺治三年(1646),钱氏在降清后归乡,重拾《列朝诗集》的编纂工作,集庀史与采诗于一身。此时,旧友程梦阳亡故已三载,距离二人提议仿元好问编撰《中州集》已逾二十五载。经历了人世的种种变迁,又逢改朝换代之际,钱氏最终于顺治六年(1649)完成初稿并进行刊刻,直至顺治九年(1652)刻成并作序。

## 二、体例编排

清前期编选明代诗文总集蔚然成风,《列朝诗集》就是其中最著名的选集之一,其选录诗人之多、诗作之广、构架之恢宏,皆足以让人惊叹。《列朝诗集》以集分部,共分为乾、甲、乙、丙、丁、闰六集。上起洪武,下迄崇祯,共计十六朝,跨294年。每集下分卷,卷中以诗系人,以人系传。每卷卷首有诗人目录,卷中有“附见”诗人、诗作若干。全集81卷,选录明代诗人1832家。书前有钱氏自序。具体情况统计如下:

首为乾集2卷,录明10帝、18王之诗,附见者2人;甲前集11卷,自明太祖元末至正十二年起兵到至正二十七年建国,16年,107人,附72人,选元末明初遗老的作品;甲集22卷,自洪武至建文两朝,35年,237人,附12人,是为有明之初;乙集8卷,从永乐到天顺六朝,229人,附12人;丙集16卷,成化、弘治、正德三朝,218人,附16人;丁集16卷,嘉靖至崇祯六朝,454人,附59人;闰集6卷,收僧道、香奁、宗室、内侍、青衣、傭书、无名氏、集句、神鬼、外夷,371人,附15人。

综观全书,《列朝诗集》的体例编排中除了乾集、甲集前编和闰集是按照所选诗人之地位、身份、性别及国籍等来归类编排外,其它各集一律依照诗人所处年代之先后选录诗作并著述小传。小传独立成篇,描摹人物生动详瞻,史料价值丰富,堪称有明一代的诗苑传。康熙三十七年(1698),钱谦益之族孙钱陆琛特将诗集的小传加以集中,整理刊印,另成《列朝诗集小传》(以下简称《小传》)。

在具体的集卷编排中，钱氏还给予诗集的正编部分以特殊的寓意。《列朝诗集》是仿元好问《中州集》的体例编排的，而《中州集》自甲集开始，终于癸集。《列朝诗集》亦始于甲集，却止于丁集（乾集及闰集未计算在内）。对这种编排体例，钱谦益在《江田陈氏家集序》中解释道：“余辑《列朝诗集》，厘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部，而为之序曰：‘遗山《中州集》止于癸，癸者，归也。余辑列朝诗止于丁，丁者，万物皆丁壮成实，大盛于丁也。’盖余窃取删《诗》之义，顾异于遗山者如此。”<sup>[1]771-772</sup>在《列朝诗集序》中，钱谦益给出了更详细的解释：“元氏之集，自甲迄癸；今止于丁者何居？曰：癸，归也，于卦为归藏。时为冬令。月在癸曰极丁。丁，壮成实也。岁曰强圉。万物盛于丙，成于丁，茂于戊。于时为朱明，四十强盛之年也。金镜未坠，珠囊重理，鸿朗庄严，富有日新，天地之心，声文之运也。”<sup>[1]819-820</sup>

在钱氏看来，“癸”乃“回归”之义，象征结束和终点，若论季节，就是冬季。而“丁”以时令来说，则是成熟收获之季节。因此，《列朝诗集》不能终于“癸”集，而终于丁集，隐约寄托钱氏希望“朱明”再“茂于戊”，即明室再造之意，故续作此书，补足癸集。

对于钱氏的这层寓意，清人李慈铭有所会心，其《越缦堂读书记》曰：“阅《列朝诗集小传》，……其书一如原次，分乾集、甲前集、甲集、乙集、丙集、丁集上中下、闰集。蒙叟此集之选，成于顺治四年，自秘书院学士罢归之后，既自惭堕节，又愤不得修史，故借此以自托。其编次皆有寓意，而列明诸帝王后妃于乾集，列元季遗老于甲前集，自嘉靖至明末皆列丁集，分上、中、下，以见明运中否，方有兴者，其文亦纯为本朝臣子之辞，一似身未降志者，其不逊如此。”<sup>[2]</sup>

后人陈寅恪在《柳如是别传》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，认为钱氏《列朝诗集》“虽仿《中州集》，然不依《中州集》迄于癸之例，而止于丁，实寓期望明室中兴之意”<sup>[3]1007</sup>。尽管不忍删除亡国之音，但选诗还是暂止于明祚衰绝的甲申之前，如陈子龙等死节诸人待后入诗传，等到滇南、海上复明大统，再继续补写，使《列朝诗集》至癸集终结，成为全璧。可见钱氏存有以风雅寓史学，寄托明朝复兴的微旨。

### 三、托意微旨

钱谦益虽为明末文坛领袖，但受家学影响，从小爱史并以史官自居，从《列朝诗集》成书起因即知。元好问编选《中州集》重在借诗以存史，对此，程梦阳心领神会，钱氏也吸收了《中州集》这一观念，鲜明地表现出在山河板荡之际以诗存人、以诗证史、以诗托志的文化意蕴和历史意识。

在《钱牧斋先生尺牋》卷一《与周安期》中，钱谦益有言：“鼎革之后，恐明朝一代之诗，遂致淹没，欲仿元遗山《中州集》之例，选定为一集，使一代诗人精魂，留得纸上，亦晚年一乐事也。”<sup>[4]236</sup>保存明诗，有似存明史；为明代诗人作传，有似为明代作传。除了选录盛名的诗人及诗作外，钱氏还选录了诗文不精之人，甚至在当时已经湮没无闻的人，真正达到了以诗存人，以诗存史的目的。如《列朝诗集小传》甲集《袁宪史养福》载：“吴原博曰：‘能伯（养福，字能伯）书郭有道碑，端劲深峭，深得率更笔法，而吴人固不知有袁养福也。’当原博时，能伯已不为吴人所知，然则吴中先辈，迄于今日，声名俱沉者，又岂可胜道哉！余录诸公之诗，间有借诗以存其人者，姑不深论其工拙也。”<sup>[5]135</sup>

为人立传，需史家笔法。在《牧斋外集》卷二十五《袁泰征遗稿小引》中，钱谦益有言：“余录皇朝诗集，吴中名卿硕辅，高文大册，勒金石而征琬琰者，往往多有阙遗。而老师宿儒，小生妇孺，《兔园》之残册，蜡车之故纸，搜罗访求，不遗余力。”<sup>[4]855</sup>可见，钱氏已经意识到历史不仅是帝王将相和王公贵族的舞台，平民百姓、普通的人文学士都是历史的一部分，甚至发挥着更大的作用。

《列朝诗集》不仅是言诗，其序云：“然则何以言集而不言选？”曰：“备典故，采风谣，汰冗长，访幽仄，铺陈明朝，发挥才调，愚窃有志焉。讨论风雅，别裁伪体，有孟阳之绪言在，非吾所敢任也，请以俟世之作者。”<sup>[1]679</sup>可见，言诗外，存史证史是目的。

钱氏的这一寓意也表现在小传的写法上。在《书徐布政袁诗后》一文中，钱氏说得更为明确：“余撰此集，仿元好问《中州》故事，用为正史发端，搜摭考订，颇有次第。”<sup>[5]158</sup>小传对历史事件、人物多有核正，对正史多有裨益。《明史·文苑传》很多传记与钱氏《列朝诗集小传》吻合，难说不是

参考《小传》而成。

时隔二十余年,钱谦益降清,接着弘光帝被害,南明小朝廷一年间灰飞湮灭。历史转了一个弯,似乎惟有到此时,钱氏才具备足够的理由再度拾起《列朝诗集》的编选工作。除了以诗存人,以诗证史外,他也常借《小传》抒发故国之思、兴亡之感。丁集下《何秀才允泓》:“季穆(允泓,字季穆)为诗,才力横骛,驰骋李、何、王、李之间,欲与之上。下。久而学殖日富,历览宋元名家之作,怅然知俗学之非,思进而求之古人,而年已不待矣。病革,语其友曰:‘悉焚吾所为诗无留也!’……其诗论亡宋胜国遗事,援古谕今,菀结沉痛,由今日思之,尤可为腹悲也。余录季穆诗,为千古存此一人,岂惜小子辈哉!”<sup>[5]598</sup>

再如丁集上《金陵社集诸诗人》回忆承平时期金陵之胜后,他感慨曰:“台城怀古,爰为凭吊之篇;新亭送客,亦有伤离之作。笔墨横飞,篇帙腾涌。此金陵之极盛也。戊子(清顺治五年,即1648年)中秋,余以银铛隙日,采诗旧京,得《金陵社集诗》一编,盖曹氏门客所撰集也。嗟夫!日中月满,物换星移;舟壑夜趋,饮猎旦改。白门有鸟,无树枝之可绕;华表归鹤,怅城郭之并非。撰文怀人,吁其悲矣!谓我何求,亦无梦焉。”<sup>[5]462-463</sup>既悲叹明亡,又感慨身世,充分寄托了钱氏的黍离之哀和时世之感,不独论诗而已。

此外,在《小传》中,钱氏把刘基的诗作一分为二。他在甲前集首《刘诚意基》中有言:“自编其诗文曰《覆瓿集》者,元季作也;曰《犁眉公集》者,国初作也。……孟子言诵诗读书,必曰论世知人。余故录《覆瓿集》列诸前编,而以《犁眉集》冠本朝之首。百世而下,必有论世而知公之心者。”<sup>[5]13-14</sup>

又在甲集首《刘诚意基》中曰:“余考公事略,合观《覆瓿》《犁眉》二集,窃窥其所为歌诗,悲惋衰飒,先后异致。其深衷托寄,有非国史家状所能表其微者。……虽然,史家铺张佐命,论蹇项之殊勋;永新留连幕府,惜为韩之雅志;其事固不容相掩,其义亦各有攸当也。诵犁眉之诗,而推见其心事,安知不以永新为后世之子云乎!谨撰定犁眉

公诗,居国朝甲集之首。”<sup>[5]70</sup>

对此,钱穆先生在《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》中看出了其中的隐曲:“牧斋此编已在清时,而书名《列朝诗集》,不加冠一明字,其所为小传,皆直称本朝,是盖牧斋之自表其微意,虽失身于清廷,而心终在明,故其文亦分《初学》《有学》两集,《初学集》皆明时作,《有学集》乃入清以后作,是犹如伯温之《覆瓿》《犁眉》分集也。牧斋欲后人分别而观,得其用心,殆借伯温以自喻耳。”<sup>[6]</sup>钱氏这样做,是他认为刘基有着双重身份,一为元代遗民,二为朱明功臣,而凡为功臣者,都不害为遗民。钱氏如此安排,有为今之后死者宽假和兴起的可能。这种体例寄托的心志,有着反清复明之宣扬,寓意“明室中兴”之期待,一定程度上触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地位,所以此书在乾隆年间与钱氏其他著作一并遭到了禁毁。

总之,《列朝诗集》的成书过程体现出钱谦益的诗史意识,不独是为了保存有明一代的诗歌作品,更是为了以诗存人、以诗托思。需要指出的是,从这一立场出发,钱氏在明亡之际的编纂工作,还暗含了为自己降清而赎罪的意图,“夫牧斋著书,借此以见其不忘故国旧君之微旨。胜时自命明之遗逸,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,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,始可称为平心之论。”<sup>[3]1005</sup>私以为,陈寅恪先生对钱氏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。

## 参 考 文 献

- [1] (清)钱谦益. 牧斋有学集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6.
- [2] (清)李慈铭. 越缦堂读书记(卷八)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63:608.
- [3] 陈寅恪. 陈寅恪集·柳如是别传[M].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9.
- [4] (清)钱谦益等. 牧斋杂著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7.
- [5] (清)钱谦益. 列朝诗集小传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3.
- [6] 钱穆.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·卷六[M]. 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4:115.

(下转第100页)